

金沙江风物外纪

朱飞 著

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

許序

多采多姿的金沙江風物，縱橫捭闔，矯若游龍的筆調，構成這一卷「風物外紀」的特徵，是史的詩，是地的詩，也是詩的化身，文的別裁。三餘展卷，足供臥遊。尤其使我向往的這金沙江上的風物，正是我往日探討南詔是否泰族故國時，夢寐求之的參攷印証之資。無奈寄身絕域，海山遠隔，有此心願而無此機緣，徒使我悵望天涯，心懸神馳而已。不意朱飛先生却別具隻眼，抱此雄心，在金沙江上作野外考察，致察而能滿載而歸，歸而能供諸同好。如此氣概，如此風度，值得欣慰，值得頌讃！

談南詔和泰族的關係最早的是，是一位法國姓名的英國學者刺古柏氏(*Tarrien de Lacouperie*)，最糊塗，最胡謅的是刺古柏，傳播最廣，影響最大的也是刺古柏。他因為南詔的「詔」字是王的意思和暹羅話相同，而斷爲泰族所建；又因爲羅馬字拼切的「南詔」與「南巢」同音而斷言泰族最初的根據地在揚子江流域。現在我們可以斥他一派胡說，但在當時却大爲標新立異的歐美學者所歡迎，更使「夜郎自大」的暹羅人興奮，大做其文章，大吹其喇叭，甚至大寫其不知所云的攷証。往

且我在暹羅，曾和他們的史學泰斗李光榮氏激辯過一場，回到星洲，我就寫了一篇「南詔非秦族故國攷」，指出他們的糊塗。後來有一位英國朋友遠道來訪，要利用我文中的資料作他博士論文的張本。我既無意於巴圖上進，又深感追求真理的同志難得，因此盡力玉成他。

南詔就是現在的大理，大理的土著是民家，如果我們要知道南詔是否秦族所建，只要考查民家是否移族便能迎刃而解。誠如朱飛先生所說，調查民族不能單憑語言，但語言不失為重要証據之一。誠然有些民族以某種外國語為官方語言，但他們仍保有著他們的母語。即使一個民族已被另一個強大民族所征服，更即使消滅了他們的語言，但終不能連他們的習俗也一起給消滅掉。民家是否秦族，我們至少可以從他們的語言習俗找出或多或少的痕跡。根據各方面的報告，民家並無絲毫秦族色彩的跡象，可見民家為秦族之說，祇是捕風捉影之談。朱飛先生就看得清楚這些，所以他斷言他們祇是臆測而已。

朱飛先生提到台維斯（Major H.R. Davies）說的民家語中有百分之二是泰語，我却要指出他的百分之二，祇是根據一百個民家語詞而言。他那一百個語詞，有何標準可以代表全部民家語。要不然，我可以舉出一百個漢語語詞，證明牠是外國語，甚至是某一種外國語。一百個語詞決不可能統括一切語詞。我會把一千三百多個民家語詞加以分析，結果發現假借的漢語凡八百多個，和泰語發音近似的，祇有寥寥幾個。例如民家語「去」 Bai 邊讀作 Pai，民家語「鬼」 Gai，邊讀作 Kai，

我認為那是遠古時代數種語言從同一種母語分歧後殘存的跡象，因此數量雖很少，分佈却很廣。就把這兩個字為例，暹羅話「去那裏」作 Pai nai 和廣東的四邑土話完全一樣，又如「鷄」，四邑話也叫作 Kai，比民家語更接暹羅語。你能說四邑話就是暹羅話嗎？

我又在純粹的民家語詞中，挑選一百個日常應用的語詞，來和暹羅話，北京話，廈門話，廣州話，作比較研究，結果我找不出牠和泰語有何因緣。我把民家語詞中的複合語詞加以研究，發現牠全是利用漢語單字複合而成的，例如「橘」叫做「黃菓」，「粥」叫做「水飯」，「天井」叫做「假四戶」，「乞丐」叫做「討伙食人」，「玉蜀黍」叫做「六穀」，「大姆指」叫做「大手指頭」。

我再比較牠們的語法，發現（一）民家語和漢語，泰語都有區別指件字，如一頭牛，一匹馬的「頭」和「匹」等字，三種語言各不相同。（二）形容詞的運用，也不一致，例如中國話說「一隻肥豬」，在民家語有兩種說法：

Go dai a der (肥豬→頭)

Dai a der go (豬→頭肥)

而泰語則為 Ino wun tua nuing (豬肥隻一)，三種語言的次序完全不同。（三）民家語的代名詞與格 (Objective case) 分「受格」與「施格」兩類，比如說「他罵了你」，民家語作 Bao ur Io

Iao（他罵你了），又如「我借了你的錢」作 Ngao Jier Io mo chieh（我借你的錢），兩個與格的「你」不相同。

民家語和漢語，泰語不單語詞不同，語法不合，連語音系統也不相同。語詞，語法的不同，是由於民族心理範疇的各別，語音系統的不同，是由於民族生理作用的差異，既然心理與生理都不同，怎麼能成爲一種民族？

朱飛先生曾注意過這個問題，也會實地勘察過民家風土，並且在這本「風物外紀」內也會屢次提及這問題，因此趁他要我作序的機會，順便提出來和朱飛先生並各地通人共同商榷。

許雲樵，一九六〇，九，一〇，於南洋大學南洋研究室。

中國人地理分佈緒論

—代序—

中國人（註一），就狹義說是一民族；民族多少帶有文化和政治的意義，然就其血緣看，可目爲一人種的集合體，可稱爲人種或次於人種的亞種，或可稱爲種族（註二）。這種族的集合體，經無數代的複合、混合和融合，而熔成或分化爲現在的各型類；如果我們要嚴格區分各型類爲何種屬，除了那些被壓迫退居於邊緣地帶的種族，因隔絕反分化的結果，而形成的體質和文化的特徵可資探究外；至於高度混合的種族，很難得到一客觀的結論。

一般的論說，這種集合體，無論其生理的機巧和保守性的堅強至若何程度，而地理條件所予的影響，自然淘汰所予的演變，都可以引起劇烈的變化，諸如惡種排除（Elimination）的法則作用於隔離的地域時，可以形成人類支脈（Stock）。這支脈，嚴格說起來就是人種。這種蛻變，其生活型態的形跡，或即遺留下來，可爲追溯源流的資料。如中國人的家族制度，可因譜牒的記載得以考証血緣的關係，從而辨別其混合的過程，但這僅是劃分種屬的輔助參攷資料而已。

種族的型類，人類學者均以體質的異同，作為分類上的主要根據；並以文化語言為分類上的輔助，藉以類歸地理分佈。就一般的分類標準說，中國人是屬於直狀毛髮人種的一支脉（註三）。然而中國人種族複雜，要真正類歸其分佈地帶，從體質上的標準以尋求其準確性，甚為困難。就以地形、氣候及個人意志等的相互作用說，直可以破壞體質根據的準確性。因為在廣漠地土上的遊蕩者，挾其原有的生活技術，以適應或克服其所處的環境，或因風土馴化，或因自然變化，或因突變，以至因轉變、流徙、混合等作用，而使同類的因孤立和隔絕而別立支脈，構成彼此不同類的觀念。筆者曾以巫山區阿細人為考察中心，他們沒有文字，僅有傳說，說先住民是羅羅，後來因銅礦發達，漢人移入，以風土馴化的緣故，漢人被同化。該區以單姓為主，証其來歷，口碑中僅能追述他們來自路南的板橋鎮，是明初從軍屯田於青山口而移入的。但因時代久遠，經同化結果，全說藏緬語。我們並不否認體質的重要，更不否認高質為劃分人種的首要，不過以中國人的血緣成分看（註四），與其說是複雜，毋寧說是單純。我們就中國人所形成的支脈看，類似由內部的複合與分化而成的結果，若以內部的分化或融合的結果而目為不同種屬，實有待商榷的必要。比如兩親配合而生的後代，那後代所遺留的體質，母型多或父型多，不用說譜牒學家技窮，就是發生學家也很難確斷，何況子代的代序與不同親屬配合，其所遺留的子代步入另一階段，假如第三代的子孫，分居於兩不同環境的地域，經過數代後，而後使兩支派匯合，勢必產生一顯然的差異。如移居者與外界隔

絕，尙保留有其原有的文化，而語言因生活上的需要，必須創造應用的語彙，這種語彙，或因口語的傳遞而轉音，失掉原來語的語音語調，形成一第三種語。如移居者處於四通八達交匯的地區，則無論其保守性若何堅強，終不免與外來語或土著語相混合，也成為第三種語。那麼當這二支派匯合時，便目為不同種屬了。所以中國今日境內的苗僑，在體質上與漢族無何差異，據調查，其體質上的指數：體高 157.75 cm.，頭指數 82.23 cm.，面指數 77.55 cm.，鼻指數 81.74 cm.。從體質上說，實不能說與漢人不同，但因語言及生活型殊異，被目為不同種屬。我們左右指出這些事實，並不是有意否認科學的合理根據，僅是指出許多種族集合體的中國人，是納入在同一文化延續性的範疇中，而我們所欲求知的問題，是如何去獲得各系羣那波浪式的融合所遺留的跡象，藉以探討地理分佈的實在性。由客觀事實的推斷，我們以為種族間有着過渡的地帶（註五）。

根據上述的觀念，類歸起來，中國人是集合華夏、東夷、荆吳、百越（上四者綜合為漢族）、東胡、苗僑、藏緬、蒙古、回、畲獮、馬來、撣、猛卡蔑等十三大系羣。每一系羣中，括有許多支脈，如藏緬語系人括有羅羅、窩尼、栗葉、保黑、阿卡、西番、麼些、怒子、古宗、俅子、馬魯、喇奚、阿繫、阿昌、卡欽（註七）等。這些系羣，我們如就史實和民族遷移的路向加以探究，有一明顯的輪廓，即除了處於版圖邊緣的民族與他系羣的接觸較少外，其他各系羣的交往却至為頻繁。但不論其接觸多少，就其交流的遺跡看，羣與羣間，各有其交替複合的過渡帶，而最顯著的特徵，

是文化的傳遞、拓展、爭奪及血緣的大混合。

我們以爲文化的傳遞、拓展、爭奪和融合，不是文化本身的力量，而是那時在流動、播遷、角逐的人類的力量。但人類文化的成熟，是經驗累積的總和，若刺激使其創立獨具一型的文化，似乎不在於孤立隔絕系羣中的地區，而是在易於生存的環境，種族來往最頻繁的區域。這種事實，不論從推理或實據說，都予我們一基本的認識：即棲居於最頻繁地區的土著，可以學習各種不同的文化和注入新的血液，從而加以選擇改創形成一卓絕的文化型。這由總和而創造出來的文化型，往往比其他墨守成規之系羣的文化高出一籌，也往往成爲系羣中的強者。可是由於追求精神和物質文明的發展，便失其原始武勇的生命力，往往爲强悍蠻族攻擊的對象，也是文化的大熔爐。從中國人的鬥爭史和播遷史看，像這種爭奪的地域，爲治史地的人所習知的，如東北走廊的右北平，西北黃土高原的關中都是。若文化爭奪最烈，種族最複雜的，如西北高原的南疆，西南的分割高原是。但我們如果就歷代各系羣往返途徑的據點看，最頻繁的地區，首推陝西的涇渭盆地，綏遠的宣化盆地，長江三角洲頂點的南京，長江河谷盆地谷底的武漢，成都平原的成都，珠江三角洲上的廣州，雲南的昆明和大理盆地；其次如一據點或交通要隘，諸如渡口、山口、關隘、達板、丫口、脊嶺、壩子……都是人文地理的過渡帶。不過如要探究其實在性，要像有機體的細胞組織，去分析各個有關的部門，冀求得一或然的比釋。而這種探究工作，不單是人種的，民俗的、文化的、語言的、地理

的，還需要歷史的，以及有關的資料協助。比如前面所提的華夏、荆吳、東夷、百越都是歷史的名詞，今日合稱爲漢族。其實在歷史上，他們都各有其特殊文化，後來因互相角逐，而融合成爲同一具文化型的民族。他們所角逐的地帶，就是文物富庶的中原黃蕩區。這地區可目爲一由南而北，由北而南，由東而西，由西而東的大過渡帶，相當於東經 $100-130$ 度，及北緯 $30-35$ 度間的地區。即春秋戰國時代列國列族交綏最繁的區域，如果我們把列國爵姓及存滅（註八）製成地圖，便可以明瞭南方民族與北方民族長期鬥爭所爭奪的地區，是經過一長時間的歷史所型鑄的結果，對於文化及民族的混合，可獲得一更明白的解釋。同時也可從這張列國地圖上，獲悉孕育漢族的熊兆。

我們這種論叙，若以體質人類學觀點說，當然要受非議的。但如果我們承認由經驗累積而傳遞下來的文化，披播於大地上的寶物，是分佈上的重要材料，那麼我們的論點，委實是中國人地理分佈的重要根據。茲爲比釋起見，我們試以種屬不明的福佬人及西南民族的聚羣爲例，畧述其梗概。

福佬人，一般的說是操閩語、台灣語、潮汕語及瓊州語方言的漢人。從語言系統上劃分，稱爲福佬語系人，在中國語言人數比率上，據說佔全國第二位。而這種人，在人類學上還是一謎，有的說是東南沿海的原住民，有的以爲是從中原遷入的遷民；有的以爲是原居住南洋羣島，後來經菲律賓羣島流入的米蘭尼西亞人（Melanesia）。三者各有物徵，但三者均不能圓說。以物徵既屬片段而又含混，離判斷時間尚嫌太早，惟就語言系統說，的確是屬於漢語系的人。不過這種人，若根據

史實論斷，當以百越系爲主。

誠爲中國古代南方的一民族，上面貫以百字，表明其種類的繁多。而載於史冊的，有大越、於越、揚越、甌越、閩越、駱越、南越、百越、山越、越裳……等。百越分處於南方山間，佔地很廣，相當於現在長江以南地區，包括江蘇、浙江、江西、福建、廣東、台灣，廣西、湖南、貴州、雲南等省及越南，或輒及於中南半島及亞參密。這種人，據史冊所載，風習有異於中原，被目爲一異族。

據漢書嚴助傳說：「越，方外之地，斷髮文身之民也，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，自三代之盛，胡越不受正朔，非端弗能服，威弗能制也」。上所引的，是表示越是一異族的記載。可是越異族，於體質上並無記載，而於文化上根據記載，與中國不同的有：（一）斷髮文身，（二）契臂，（三）食異物，（四）巢居，（五）語言不同（即鳩舌之民），（六）使舟及水戰，（七）銅器。那麼，百越究竟屬那一種族，到現在還沒有確說。一般人的論斷，以爲現在閩粵居民的體質，頗似馬來人，不知古代的百越和馬來人是否有關係？現在台灣的番族尚有文身的風俗，已斷爲馬來人，而其容貌與粵人相似，這種番人是否與古百越人有關？現在閩江粵江江口的「曲蹄」和艇戶，以及在陸上的蕃民，是否和古越人有關？這些問題，於史跡上都很难尋究的。我們所能知道的，只是於越自句踐後，不數傳爲楚所滅，到了秦漢時，建立甌越閩越二國。甌越在今浙江，閩越在福

建。這麼說，越族的分佈地域，似乎就在今日的閩浙境內。但現散聚於浙南、閩北、閩西、閩南的畲民，據攷並非土著，而是明代由廣西湖南移入的，不知是否爲古越人殘留的倒流？

據史籍所載，甌越和閩越二國的君主，都帶着勾踐的後代。但在漢代却互相攻伐。那時東甌附漢，自請徙居江淮，而閩越偏強抗漢，終至破滅，人民也被遷徙到江淮去。自此兩次大遷移後，荆吳系便與越系大混合，因此在民族學上，百越系爲一難以解答的謎題，尤以居住於東南沿海的福佬人爲最。現在的福佬人，率不自承爲土著，有口皆碑的說是在南北朝及五代遷入的遷民。就語言立場說，這種口碑是有可取之處，學者以爲其語言是漢語字的第二大群，便以福佬人目之，我們於其種屬尚無明斷之前，也稱爲福佬人。

學者以爲判斷一種屬，單憑語言，風俗，體質不足以爲斷，現在體質無可攷，而風俗又與中原雷同，僅有語言可資追究。據今日的福佬語，以其語調、語氣、語法、語音在原則上與漢語類似，所不同的是字讀一音，說話又一音，或語法上有所參差；惟讀音則存有隋唐音素。後來與漢語系（官話）混，因地域隔閡，且無文字記載，二者交相轉音，而至於因地而殊，竟有好幾百種不同的語調。好比官話的「一點兒」，因轉音的緣故，若以文字註音，則福州話可能寫成「石滴仔」，泉州話爲「這滴仔」。遂譯下去，可能有「索滴仔」，「石湧仔」，「湧湧仔」，「滴滴仔」，「點點仔」……等的變化。如再以官話發音用文字註起來，或因語調的互有高低，或將變成「衣典二」，

「椅墊兒」，「意願耳」，「嘆田爾」等編爲文辭了。又如說、講、談三字，在表達語言的意義上是相同的，而於方言語氣的採用則不同。這三個字的原義，都是「說話」的「說」字，但福州和廈門話要用講（Kong），泉州話用說（shie），潮州話用談（Ta）。又如官話的「不行」，在福佬語中有字不同而義相同的字，即廈門話的「使」，潮州話的「幹」，泉州話的「做」。三字的上面均加「不」字，而「不」字須用古音讀，讀起來爲（Boeshai，Boekan，Boechoe），倒翻爲官話，便是「使不得、幹不得、做不得」。如上所說，可知福佬語固然與漢語同一系統，但也有出入的地方。遠不同，可能是根遺着古代的民族語彙。而且這種出入，就其分佈上說，則偏於沿海，若以分佈的範圍劃一線聯繫起來，恰與交通史上的東西洋航線（註九）相符合。東線括台灣，菲律賓至印度尼西亞群島；西線自浙東、福建、廣東沿海岸、雷州半島、安南、暹羅、馬來亞半島至蘇門答臘。這二線所環抱的區域的人群，儼然獨立的系群，也是學者所致力求解答的問題。海豐史前及香港舶遼洲史前遺物的發現，於民族遷移有所指示（註十），同時衛聚賢氏在浙江會稽發現的古代遺物也可資佐証。有人以爲，是來自海洋，但據陳公哲氏的民族推論，則斷爲來自中原（註十一）。

不過白語系本身的分佈說，實以東南濱海地帶爲主，即北起浙江南迄潮汕，西界南嶺的遠塊（註十二）。似以此塊爲老家，向海外及向西拓展消長。就濱海地帶方言的分佈說，有過渡的現象。大致以福州、泉州、潮州三地爲中心，莆田是福州與泉州的中間語，漳州是泉州與潮州的中間語，廈

門爲漳泉的混合語，台灣爲漳泉潮的混合語，海南是莆田潮州的混合語。消長於海外的，則以自中國移入的人數多寡爲根據，如菲律賓的中國人說泉州話，而暹羅的中國人則以潮州話爲主。至於與中心地帶附近的語言，也有其過渡的中間語；如龍岩是漳州與客家的中間語都是。由是可知，不論種屬如何，就語言的分佈，煞費我們探求的了，遑論其他的呢？我們感到遺憾的，關於福佬語系人，史籍的記載實在太少了，地理書籍及民族誌上，有關這種人的特質，也是簡短的三言兩語交代過去，甚至有人根據氣候環境論，作不能自圓其說的臆斷。因此，我們以爲在這東南古陸地塊上，田野工作，是急不容緩的工作，過渡帶，或即是協助整理的一方法。

居住在東南古陸上的福佬人，是問題重重；由古代地中海形成的西南分割高原，跳躍着的民族，也不易清理，同樣的需要實際的勘踏，以追尋一脉相承的線索。

西南分割高厚，一般的說是文化的總匯區。各族先後移入，但因山川阻隔，交通不便，各族文化得以繼續保存下來。若由其所蘊藏的景觀說，儼然是一小中國。本區民族的分佈，以分割高原爲主，而括有四川、西康、湖南、廣西、越南、緬甸、暹羅等地。這廣土的居民，還沒有大規模的體質測量，所標立的派系，純以語言爲根據。語言人類學者，對於人類的語言，確已能根據科學的方法，解決滲透了的語言，而加以分類。羅莘田先生從語言上論雲南民族的分類，分爲兩系四組十一支並附民家。我們認爲他的分類頗稱公允，便依據他的分類，概說各族的地理分佈。

1. 漢藏語系撣語組：本組分爲仲家支，括仲家、儂人、沙人、僮人、黎人。擺夷支，括擺夷、呂人（或水擺夷）。

仲家爲沒有文字的撣人，分佈於紅河東，由貴州移入雲南東北；儂人、沙人從廣西西移至雲南東南。

擺夷爲有文字的撣人，其分佈中心在東經九十九度至百零四度間，北緯二十三度以南地帶。換句話說，擺夷的分佈，集中於雲南西及西南的邊境。不過據戴維斯的報告，在昆明北的普渡河沿岸，也遇到少數擺夷村落，他又轉述嘉納（Garnier）的報告，說在雅碧江及金沙江的交叉處遇到擺夷。其所發現雖微，而於民族遷移問題則甚重要。呂人及擺夷皆從廣西及東南的邊境遷入，到了雲南後，即循紅河、瀘滄江、怒江等河北上及南下，分佈於諸河的本流及支流的夾谷與小平原中。

2. 漢藏語系苗儂組：苗有廣義和狹義的分別，通常稱爲苗子，苗人或苗族，是廣義的西南民族的總稱。狹義的，則爲純粹的苗人。凡是純苗人，他們均自稱Mon，有紅苗、黑苗、白苗、青苗、花苗等。一般的說，以貴州爲大本營，紅苗在東，黑苗在西南，白苗青苗在中部，花苗在北及西北，而實則難處。苗人以貴州爲中心，向四方分散，湖南湘西多紅苗，次爲黑苗；廣西與黔滇三省毗連處也有散處的苗人；川南及滇東北有白苗花苗；滇東南有白苗青苗花苗；而花苗在雲南分佈最廣，自迤東至迤西均有；越南的東京北部多白苗，青苗次之；緬甸景東、孟信有白苗花苗。所以

苗人的分佈，東起湘漓，西迄怒江，北達長江，南抵紅河，但地域雖廣，而人數不多，除貴州、湘西、滇東較集中外，其他各地則零散，大體的說，東經百零三度以東爲苗人的藪聚地帶。

關於僂，其分佈地域較苗人廣闊，東起浙江，西及緬甸，惟以廣西爲大本營。自史言，僂不是新興的民族，大體藪聚於長江以南的叢山中。宋以前相安無事，所以事跡不多見，及宋以後，因被迫而亂事迭出不窮，尤以明代的亂事最多，類皆發難於南嶺，也可以說南嶺是僂人的大本營。

3. 漢藏語系藏繩組：本組較爲複雜，分爲羅羅、西番、藏、緬、野人五支茲以羅羅、栗棗、倮黑、西番、俅子爲例。

羅羅的分佈，據戴維斯說，分佈於北緯二十六度以南，而以墨江爲主要區；陶雲達先生以爲羅羅人分佈的中心，爲二十二度至二十三度半，及東經百零二度左右。其實若以經緯度劃分，應爲北緯二十度至二十八度，東經百零一度至百零二度間。

栗棗的遷移，是從北而南，現在的分佈中心，在東經九十八度至九十九度半，北緯二十五度至二十七度半間，居住於雲嶺、雪山、碧羅雪山、高黎貢山等山顛；即分屬於維西、貢山、康樂碧江、瀘水等設治局。據戴維斯、白朗（T.C.Brown）、羅思（A.Rose），伏來塞（F.O. Fraser）諸氏的意見，說金沙江右岸的武定，元謀以及更北，也有栗棗和栗棗村落。

倮黑，自稱爲（Ladu），現在分佈中心，東經九十九度五十分至百度五十分，北緯二十二度至

二十四度半間，即瀾滄江及怒江之間，順寢以南，佛海以北地帶。瀾滄江右岸景谷，鎮沅縣境也有少數。

西番分佈於雲南西北及川康交界處，在雲南的，以摩些及怒子居多。摩些，自稱（Nashi），其分佈中心，在東經九十九度二十分至一百度二十分，北緯二十六度半至二十七度十分間，即金沙江南，屬於永寧設治局（麗江縣屬和永北縣屬），此外中甸，維西、蘭津諸地也有摩些人。怒子，自稱Anu，分佈於東經九十九度左右，北緯二十六度至二十八度半間，即怒江流域，也即高黎貢山東麓，及碧羅雪山西麓地區。爲貢山、康藥、碧江三設治局的轄地。

俅子，又稱曲子，自稱毒龍（Dulong），分佈於東經九十七度五十分至九十八度五十分，北緯二十七度至二十八度間，即毒龍河流域，位於高黎貢山及江心坡間。

4. 南亞系猛吉蔑組：本系原來的分佈地，在瀾滄江及怒江間，後越瀾滄江向東及東南移植。在本區有蒲蠻、卡拉、卡瓦、崩童等旅。

卡拉及卡瓦的分佈，西以怒江，東以怒湄二江的分水嶺爲界，在北緯二十二度至二十四度間，即英人所謂的卡瓦地（Wasata）惟鎮康，龍陵，騰衝也有卡拉。崩童，爲英人葛利生（Grierson）所發現，分佈於雲南的極西，即東經九十九度以西，北緯二十五度以南地帶。

5. 民家組：在語言分類上尚在爭論中，戴維斯、凌純聲、陶雲達等認爲應屬猛吉蔑語組，丁